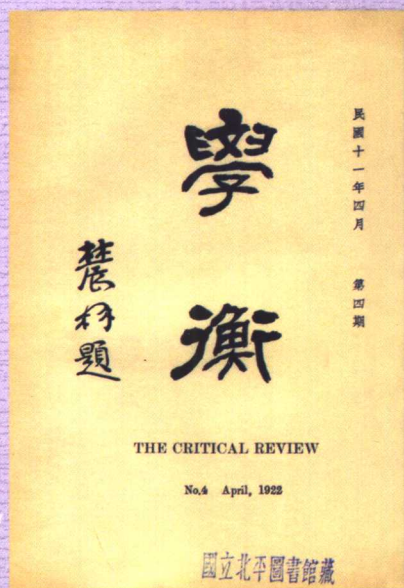


現代中國

第五輯



现代中国

第五辑

湖北教育出版社



(鄂)新登字 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中国. 第 5 辑/陈平原主编. —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4.12
ISBN 7-5351-4128-5

I. 现… II. 陈… III. 社会科学-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1770 号

出版 发行:湖北教育出版社
网址: <http://www.hbedup.com>

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
邮编:430015 传真:027-83619605
邮购电话:027-83669149

经 销:新 华 书 店
印 刷: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版 次:2004 年 12 月第 1 版
字 数:362 千字

(430223·武汉市江夏庙山开发区汤逊湖工业园)
1 插页 18.5 印张
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2 000

ISBN 7-5351-4128-5/G·3420

定价:28.00 元

如印刷、装订影响阅读,承印厂为你调换

沈从文

第五辑

目 录

论 文

- 晚清北京南城的“堂子”…………… 么书仪(1)
- 旧戏台上的文明戏
- 田际云与北京“妇女匡学会”…………… 夏晓虹(28)
- 香山健锐营与京城八大胡同
- 穆儒丐笔下民国初年北京旗人的悲情…………… 张菊玲(48)
- 世变中的音乐教育与音乐家
- 由北京李抱忱到广东黄友棣…………… 沈 冬(66)
- 既“远”且“近”的目光:林语堂、德龄公主、谢阁兰的北京叙事…………… 宋伟杰(81)
- 龙须沟:城市景观与历史记忆…………… 柏右铭(103)
- “国都”与“全球都市”:双重想象的混杂…………… 张颐武(122)
- 台湾人在北京:1949 前在京台湾作家简论…………… 奚 密(131)
- 林海音与凌叔华的北京故事…………… 梅家玲(145)
- 北京梦华录:北京人到台湾…………… 王德威(159)

评 论

- 北京大学“校”与“刊”的结合及其“公共空间”的开拓…………… 陈方竞(167)
- 蔡元培与老北大的艺术教育…………… 陈平原(179)
- 严谨的开拓者及其固执
- 《论鲁迅的复调小说》读后感言兼及对“五四”的反思…………… 解志熙(196)
- 现代中国“文学场”的形塑
- 贺麦晓《文体问题》阅读感言…………… 张松建(216)

书 评

《文学中的城市》(Richard Lehan)	季剑青(227)
《世纪末的维也纳》(卡尔·休斯克)	崔问津(231)
《世纪末的维也纳》(卡尔·休斯克)	张丽华(236)
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》(本雅明)	熊 权(241)
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》(本雅明)	王 璞(245)
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》(本雅明)	彭春凌(250)
《增订 长安之春》(石田干之助)	吉田薰(256)
《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》(谢和耐)	王振峰(259)
《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》(谢和耐)	张 治(263)
《刘伯温与哪吒城》(陈学霖)	张 寒(266)
《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》(施坚雅)	何宏玲(270)
《北京:城与人》(赵园)	汤 莉(273)
《北京:城与人》(赵园)	丁 文(278)
《上海摩登》(李欧梵)	詹 勇(282)
《上海摩登》(李欧梵)	王 申(286)
作者简介	(289)
编 后	(292)

晚清北京南城的“堂子”

幺书仪

乾隆五十五年,“四大徽班”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进京。这不仅给京师舞台带来了新演员、新声腔、新剧目,而且对于晚清北京南城娱乐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。它既促成了南城京剧的繁荣局面,也造就了南城“堂子”业的繁盛。而事实上,晚清北京南城的娱乐业主要是由这两个部分构成。

清代所谓“南城”的说法,是对于明代区域名称的延续。明代的“燕京”,开国时称“北平”,永乐十九年正式成为都城,称为“北京”^①。嘉靖二十三年,于九城之南,前三门(正阳门、宣武门、崇文门)之外,“筑重城包京城南一面,转抱东西角楼止。”^②“重城”的修筑,使原本四方形的北京城,变成了“凸”字形。这“重城”就是明代的“南城”。

明代的“南城”也叫做“外城”,是相对四方形的“内城”而言。“内城”又分为东城、西城、中城、北城四部分。内、外城加起来总称“五城”。

清代继元、明之后,亦建都于北京。但是,在东、西、南、北城的划分上,自立制度。《日下旧闻考》记载说是:“今制,内城自为五城,而外城亦各自为五城,正阳门街居中则为中城,街东则为南城、东城,街西则为北城、西城。”^③《宸垣识略》中说:“本朝五城,合内外城通分。”^④《日下旧闻考》于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问世,《宸垣识略》的序言写在乾隆五十三年,两书刊刻几在同时,说法却相去甚远。可见,清代重新划分、命名内、外城的区域,已经发生混乱。但是,约定俗成仍然习惯于把前三门之外称为“南城”或“外城”。

本文所说的“南城”,也是这个概念。文中涉及的地区,主要是指正阳门、宣武门、崇文门之间,向南延伸到永定门、右安门、左安门中间的部分。也就是《宸垣识

① 北京大学历史系《北京史》编写组编写《北京史》(北京,北京出版社,1999年)页161。

② 清·于敏中等《日下旧闻考》(北京,北京古籍出版社,2001年)页606。

③ 《日下旧闻考》页886。

④ 清·吴长元辑《宸垣识略》(北京,北京出版社,1964年)页18。

略》中说的“外城西北”“外城西南”的东半部,以及“外城东北”“外城东南”西半的一部分。中心地区是大栅栏、八大胡同、肉市一带。

晚清,北京南城面对中上阶层消费者(主要是官员、文士、商人等)的娱乐业,主要是戏园和“堂子”。听戏、打茶围,是京师有闲、有钱人的主要娱乐方式。“堂子”在晚清,出现了兴旺的局面,所以南城戏园多、“堂子”多。“堂子”在南城的兴旺,应是由多种因素促成。

1. 南城的仕商云集

清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兵进入北京的第二天,就颁布政令,将“内城”划为八旗驻地,按照五行定位:镶黄、正黄驻于城北;镶蓝、正蓝驻于城南;镶红、正红驻于城西;镶白、正白驻于城东。星罗棋布,拱卫皇居。而原来居住“内城”的汉人,在三天之内一律迁往“南城”或者其他地方,实施“满、汉,兵、民分城居住”。

多尔衮实施“满、汉分居”的初衷,或许更多是出于“安全”和“管理”的考虑。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,是重构了京城组合的格局:亦即“内城”集中了帝王、贵族、官僚、地主、书吏、太监、差役、旗丁等;而“外城”则是汉官、汉人士绅、文士、商户、工匠等的居住地。清军在实行“满、汉分居”政策的时候,非常严格;商户与汉官在南城的居住区域,也有分别。“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,皆居外城,多在宣武门外,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,故有东富西贵之说。”^①

清朝科举沿用明制,三年一科,“辰、戌、丑、未”在京城举行“会试”“殿试”。举子们进京赴考,在京城就会有交友、受聘、游学、论道等活动。而康熙年间纂修《明史》,乾隆年间编辑《四库全书》,康熙、雍正时编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……,也都被全国的儒生视为“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而“心向往之”。北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四方学者、文士寻求“发迹”的地方。南方各省文士进京,大多路经卢沟桥进广宁门,首先到达的是宣武门外。宣南原本就是汉官集中之地,因而也就成为进京的儒生、文士居住地的首选。

《明史》总裁徐乾学和他的弟弟徐文元,《四库全书》总纂纪昀,参加过《明史》《四库全书》《大清一统志》《清会典》编纂的,诸如:姜宸英、朱彝尊、毛奇龄、齐召南、朱筠、邵晋涵……各朝进士出身的达官、同时也是有名的文士,诸如:孙承泽、吴伟业、王士禛、施闰章、田雯、查慎行、顾嗣立、王熙、黄叔琳、朱轼、李光弟、沈德潜、洪亮吉、钱大昕、毕沅、孙星衍、王杰、魏源、钱仪吉、陶澍、曾国藩、张百熙、李慈铭……著名文士、学者、诗人,诸如:胡天游、阎若璩、顾栋高、赵翼、潘祖荫……都曾在宣南

^① 清·夏仁虎《旧京琐记》(北京,北京古籍出版社,1986年)页88。

居住。他们的居住地点,有的现在还会有人言之凿凿。例如:戏曲家孔尚任的“岸堂”故地在“海波巷”(今天的“海柏胡同”)、李渔的“芥子园”旧址在“韩家潭”……明末清初“乾嘉学派”的代表人物、顺治间“江左三大家”的著名诗人、嘉庆、道光年间“宣南诗会”的“文学沙龙”,都曾聚于宣南、独领京师风骚的文人团体。而孙承泽的“后孙公园”(虎坊桥后孙公园)、朱彝尊的“古藤书屋”(琉璃厂西海北寺)、王熙的“怡园”(南半截胡同)、赵吉士的“寄园”(菜市口西南)、李渔的“芥子园”以及名刹松筠庵……都曾经是宣南士人、达官名流的酬唱、宴集之所。^①可以说,当时的“宣南”是“人文荟萃”。

北京南城也是商贸繁盛的地方。清初在工匠、商人集中到“南城”以后,这一地区很快成为繁盛的商业和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地,担负起内、外城的日用所需。一个半世纪以后,晚清的北京“南城”,已经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集散地。从道光至光绪年间,许多笔记都有对于“南城”商业繁华景况的描述:

京师最尚繁华,市廛铺户,装饰富甲天下,如大栅栏、珠宝市、西河沿、琉璃厂之银楼缎号,以及茶叶铺、靴铺,皆雕梁画栋、金壁辉煌,令人目迷五色,至肉市酒楼饭馆,张灯列烛,猜拳行令,夜夜元宵,非他处所可及也。

——清·杨静亭《都门纪略》^②

京师百货所聚,惟正阳门街……暨外城之菜市、花市,自正月灯市始,夏月瓜果,中秋节物,儿嬉之泥兔爷,中元之荷灯,十二月之印版画,烟火、花爆、紫鹿、黄羊、野猪、山鸡、冰鱼,俗名关东货。亦有果实、蔬菜,旁及日用百物,微及秋虫、蟋蟀。苟及其时,则张棚列肆,堆若山积。卖之数日,而尽无余者,足见京师用物之宏。

——清·震钧《天咫偶闻》^③

2. 南城会馆的兴旺

在北京的历史上,会馆始于明代,盛于清朝,衰于清末。

京师最具流动性的人员是官员、文士、商人。各地官员要定时进京述职、办事,各省文士要进京应试,外埠商人要到京城寻找商机。这三种人进入京城之后,都有解决食宿、联络乡谊、维护权益的问题。“会馆”便应运而生。

“会馆”一开始就大多建于南城,且尽量靠近前三门。一是因为外城的空地多,地价比内城低;二是明清的中央机关吏部、礼部、户部都设在正阳门内东、西两侧,会馆在前三门外左近,于进京述职、办事的官员比较方便;三是明清时期,举行考试

① 郑文奇主编《宣南文化便览》(北京,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2年)页8-16。

② 李家瑞《北平风俗类征》(上海文艺出版社,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板影印)页402。所引出于杨静亭“道光都门纪略”。

③ 清·震钧《天咫偶闻》(北京,北京古籍出版社,1982年)页216。

的“贡院”就在今天建国门内大街北侧(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侧),会馆当然也是以靠近前三门为宜。另外,如前所述,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,北京的商业中心南移至前三门外,会馆设在附近也方便商业活动。

据《宸垣识略》统计,“东城会馆之著者”计 82 所,“西城会馆之著者”计 100 所^①(这里所说的“东城”和“西城”,都是“外城”亦即“南城”下属的“东城”和“西城”),共计 182 所。这应当是乾隆末的会馆数字。乾、嘉年间,是京城会馆发展最快的时候。当时的汪启淑在《水曹清暇录》中说:“数十年来,各省争建会馆,甚至大县亦建一馆,以至外城房屋基地价值昂贵。”^②

光绪六年刊本《都门纪略》卷二,记载了全国各地的会馆名称和所在地址。16 省的“省馆”“府馆”“州县馆”354 所,还有行业会馆 7 所,共计 361 所。^③比乾隆末的数字,翻了一番。

徐珂《清稗类钞》说是:“或省设一所,或县设一所,大都视各地京官多寡贫富而建设之,大小凡四百余所。”^④这应当是清末的数字。民国时期北京尚存会馆的统计是:22 省会馆 402 所,与徐珂所言相合。

观察一下光绪六年的会馆,它们的所在地点大多在前三门以南,天坛以西和东北。361 所会馆,座落在这一狭长地带的将近 150 条街上,包括 116 条街道和它们的東西街、南北路、前后巷、大小胡同、以及胡同所属的分支(头条、二条、三条……)。从崇文门外向南延伸,直至天坛东北的驴驹胡同,西北的紫竹林、兴隆街。从宣武门外向南延伸,直到虎坊路、法源寺南的珠巢街、官菜园、盆儿胡同。不过,最集中的还是正阳门外、宣武门外、崇文门外左近。比如:宣武门外的椿树上、下,头、二、三条,就有 8 所会馆;教场头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条,建有 10 所会馆。崇文门外的长巷上、下,头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条,集中了 22 所会馆;而草厂头条至十条有 24 所……这都是会馆密度最大的区域。

会馆相当于今天的“驻京办事处”。不同之处是,主要不是各地官府修建主持,而由同乡集资修建,是社团性质的公产。进京外地同乡人的诸多问题,如食宿、联络、集会、酬酢、庆典、救济、殡葬……都可以从会馆求得帮助。

会馆之中,还有一些行业会馆。比如上述光绪六年的 361 所会馆中,就有 7 所行业会馆,它们是“书行”的文昌馆、“玉器行”的长春馆、“颜料行”的颜料会馆、“药行”的药行会馆、“银号”的正乙祠、“广行”的仙城会馆和惜字会馆。据道光八年华胥大夫《金台残泪记》中所言:

① 《宸垣识略》页 163、193。

② 清·汪启淑《水曹清暇录》转引自《北京往事谈》(北京,北京出版社,1988 年)页 85。

③ 清·杨静亭《都门纪略》(光绪 6 年,琉璃厂存板)卷 2。

④ 徐珂《清稗类钞》第一册,北京,中华书局,1986 年,页 185。

文昌会馆、财神会馆在宣武门外,天和会馆、浙绍乡祠在正阳门外,梨园馆在绿寿堂之北,燕喜堂在宴汇堂之东,相去约一、二里。诸贵人宴集三会馆,二徽班(春台、三庆)为盛介眉设醴结发,飞觞之外,大抵停云祖道,旧雨洗尘。^①

可见,会馆(特别是行业会馆)除了接待同乡之外,还会受理一些与礼仪习俗相关的集会,其中,筵宴、演戏是当然的节目。晚清时,南城作为全国各地驻京办事处——400多所会馆汇集的所在,每天不知有多少宴会、堂会的举办。

3. 南城的饭庄和苑囿

宴集和野游是传统的交际方式和娱乐方式。岁首团拜,游春踏青,春秋修楔,僧俗善会,中秋祭月,重阳登高,冬日消寒:不同的节令有不同名目的宴集。家人、友朋、同乡、同年、同寅、同好、同调:不同的集团亦有不同借口举办各种筵宴。结发、结婚、生子、祝寿、发丧当然就更要举办相应仪式而大宴宾客了。这些宴集多在饭庄、会馆举行。南城会馆、饭庄集中,也就成了京城宴集繁盛的所在。

清人杨掌生在道光二十二年所写《梦华琐簿》中说:

寻常折柬招客者,必赴酒庄,庄多以“堂”名。陈饌八簋,烹肥酒奠,夏屋渠渠,静无哗者。同人招邀,率尔命酌者,多在酒馆。馆多以“居”名,亦以“楼”名,以“馆”名。皆壶觞清话,珍错毕陈,无歌舞也。间或赴酒庄亦然。^②

清人艺兰生写于光绪四年的《侧帽余谈》记载:

都门酒肆,向推四大居。近年煤市桥头,新起泰丰楼。地甫三弓,室近十座,皆精雅有致。……游春余兴,且住为佳。顾客常满,座非预定不得焉。^③

从这两则晚清笔记,可见当时南城饭馆的繁盛景象。

宴集常和野游相连。南城可供野游的苑囿也不少,常被提起及的胜地有陶然亭、尺五庄、小有余芳、三官庙、枣花寺、悯忠寺、龙爪槐、极乐寺、天宁寺……记载文字之中,道光间人华胥大夫、蕊珠旧史和光绪年间艺兰生对此都有许多描述。^④

众多的饭馆、寺庙、苑囿,一年之中的岁时节令、婚丧嫁娶的仪式,都是推动南城娱乐业,特别是“堂子”兴旺的重要因素。

二

由于堂子与戏园关系密切,因而,京师的戏园和堂子的分布,也呈现很集中的

① 清·华胥大夫《金台残泪记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(北京,中国戏剧出版社,1988年)上册,页248。

② 清·蕊珠旧史《梦华琐簿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,页348。

③ 清·艺兰生《侧帽余谈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,页601。

④ 参见《金台残泪记》《丁年玉筍志》《梦华琐簿》《侧帽余谈》中的记述。均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。

状况。

徽班进京之后,京城戏曲剧坛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剧目、唱腔、表演上的世俗化趋势,与昆腔形成了对比。由此,观众的构成也有了极大的拓展。帝王、贵族、士绅之外,“引车卖浆者流”也有很大兴趣。到了晚清,戏曲的这一“雅俗共赏”的特征已经非常成熟,而且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和时尚。当时的戏曲演出,具有两大特征:一是席卷面广,二是煽动力强。从满清帝王、贵族到旗丁,从汉族官员、文士到市井百姓,许多人以迷恋京剧作为精神需要。听戏、票戏、读花谱、观菊榜、看名伶、打茶围;听戏时大声喝彩,票戏时不惜花钱买脸(买脸:意为买面子),读花谱心驰神往,看菊榜专心致志……为了讨得名伶的喜欢,闹得倾家荡产在所不惜者,也是大有人在。

汉官、商人、士人集中的南城,也是戏园集中的地方。清人戴璐的《藤荫杂记》中引用《亚谷丛书》说:

京师戏馆,惟太平园、四宜园最久,其次则查家楼、月明楼。此康熙末年酒园也。查楼木榜尚存,改名广和……^①

李大拙在为张次溪的《燕都名伶传》所写“序”中说:

至清康、乾间,京师始建戏馆,太平园、四宜园、查家楼、月明楼、方壶斋、蓬莱轩,则其最著者焉。是皆见于历代载籍,班班可考^②

到了道光年间,南城已有由与“四大徽班”同一档次的戏班子轮演的戏园子十二三处。

《金台残泪记》中说:“宣武门外茶园一,崇文门外茶园一,正阳门外东茶园四,西茶园七(大栅栏凡五园,即正阳门之西也)。”^③ 共计十三处。

周明泰《都门纪略中的戏曲史料》对于“都门纪略中之戏园”作了详细的统计。其中,道光二十五年和同治三年的京师有名的戏园子共计有 19 个。内城 3 个:龙福寺口内的“景泰园”、东四牌楼的“泰华园”、西四牌楼的“万兴园”是杂耍馆,没有正式的演剧。内城之外有 4 个:齐化门(今朝阳门)外的“芳草园”、“隆和园”,德胜门外的“德胜园”,平则门(今阜成门)外的“阜成园”,这 4 个戏园虽有正式的演剧,可是却是“戏无准转”的“小园”。南城 12 个。^④ 一些小型的戏园,还不在于统计之列。

从道光时起,四大徽班和另外几个有实力的戏班子,就在前门外几个大戏园子

① 清·戴璐《藤荫杂记》见《笔记小说大观》(台北,新兴书局有限公司,1984年)第14编,册10,页6167。

② 张次溪《燕都名伶传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下册,页1186。

③ 《金台残泪记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,页250。

④ 周明泰《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》(光明印刷局,民国21年)页139-152。

轮流转演,“诸部周流赴戏园,大园四日,小园三日一易地,亦曰‘轮转子’”^① 这种做法,应当是大的戏园子和有名的戏班子之间的调节和约定。没有能力参加“轮转子”的戏班子,被叫做“小班”,杂耍班、山陕戏班都是“小班”。没有资格参加“轮转子”,也就是“戏无准演”的戏园子,被叫做“小园”。芳草园、阜成园、德胜园都是“小园”,四大徽班都不会莅临。

京城的大戏园子都在南城。南城的12个戏园之中,除了崇文门外的“广兴园”和宣武门外的“庆顺园”也是“小园”之外。有资格参加“轮转子”的大戏园,都集中在正阳门西南的大栅栏和正阳门东南的肉市、鲜鱼口一带。它们具体的地址是:

三庆园,大栅栏中间路南。

同乐轩,大栅栏门框胡同口内路西。

庆乐园,大栅栏中间路北。

广德楼,大栅栏西口路北。

中和园,粮食店北口路西(大栅栏东口向南一拐弯)。

庆和园,大栅栏西口路北。

庆春园,杨梅竹斜街路北。

广和楼,肉市北口路东。

裕兴园,鲜鱼口抄手胡同路西。

天乐园,鲜鱼口内小桥路南。

广兴园,崇文门大街路西木厂胡同。

庆顺园,宣武门大街路西。

这12个戏园子,都在大栅栏、鲜鱼口附近,如果我们把粮食店北口的中和园也算在大栅栏域内的话,那么,大栅栏就有6个京师的大戏园子。

大栅栏一条街上,每天晚上,有6个戏园子开锣演戏。据记载,大的戏园子多至可容纳千余人,而大的戏班子也有伶人和管理人员百余,可以想象其热闹的情景。全国当红的名伶,在这里参与竞争,登台献艺。京师南城在戏曲上的消费,此时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。

在戏园子看表演叫“听戏”,到伶人家中饮酒、听歌、闲话,叫做“打茶围”。入迷的观众普遍有一种好奇的心理:看过了台上的表演,就很想一睹伶人卸装后的形象,和日常的生活样态。清代戏班子没有女子,台上的多情公子、红粉佳人都由男演员扮演,就更产生神秘色彩。投合这种心理需求,晚清就出现了相应的“服务”——名伶在自己的住处接待来访的宾客,这一收费服务被称作“打茶围”。因为名伶的住处叫“堂子”,所以“打茶围”也叫“逛堂子”。从道光到光绪,这一行业在南城发展得如火如荼。

^① 《梦华琐簿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,页351。

清人华胥大夫在《金台残泪记》中写到道光八年大栅栏西南一带“堂子”的分布,和“打茶围”的盛况:

王桂官居粉坊街,又居果子巷。陈银官尝居东草场。魏婉卿尝居西珠市。今则尽在樱桃斜街、胭脂胡同、玉皇庙、韩家潭、石头胡同、猪毛胡同、李铁拐斜街、李纱帽胡同、皈子庙、陕西巷、北顺胡同、广福斜街。每当华月照天,银筝拥夜,家有愁春,巷无闲火,门外青骢呜咽,正城头画角将阑矣。尝有倦客,侵晨经过此地,但闻莺千燕万,学语东风,不觉泪随清歌并落。嗟乎!是亦消魂之桥,迷香之洞邪?^①

以歌侑酒,原是欢场旧例。挟妓赴酒楼,各朝也是屡见不鲜。可是,晚清时候,到名伶住处去听歌、饮酒、聊天;在酒庄饭馆,飞笺点唤歌郎前来侑酒;更甚者,则是视歌郎如同娼妓。而且,筵宴上,没有歌郎就被认为不够档次;宴游时,少了歌郎也会觉得缺少乐趣……逛堂子、打茶围成为京城“寄生者”的一种时尚,是晚清独特的景观。

蕊珠旧史在《梦华琐簿》中,描述了道光二十二年时宣南一带“夜生活”——“打茶围”的景象:

赴诸伶家闲话者,亦曰“打茶围”。有改“一去二三里”诗者曰:“一去二三里,堂名四五家,灯笼六七个,八九十碗茶”。伶人家备小纸灯数百,客有徒步来者,临去各予一灯,囊火以行。中北城所属胡同,入夜一望,荧荧如列星,皆是物也。^②

这里所说的“中北城”,就是《日下旧闻考》中说的“南城”下属的“中城”和“北城”,也就是指正阳门以南、大栅栏西南(宣南)一带。清人艺兰生在《侧帽余谈》中也叙述了光绪四年的宣南一带“堂子”营业的兴隆:

明瑾……向群集韩家潭,今渐扩广,宣南一带皆是。门外挂小牌,镂金为字,曰某某堂,或署姓其下。门内悬大门灯笼一。金乌西坠,绛蜡高燃,灯用明角,以别妓馆。过其门者无须问讯,望而知为姝子之庐矣。^③

蕊珠旧史的《京尘杂录》四部笔记中,记录了从嘉庆末到道光末这一时段,最走红的“堂子”48个,它们分布在18条街上,计有韩家潭8所,李铁拐斜街6所,石头胡同6所,朱家胡同4所,臧家桥、陕西巷、小李纱帽胡同各3所,百顺胡同、燕家胡同各2所,樱桃斜街、五道庙、大外廊营、小安南营、椿树胡同、羊毛胡同、东皮条营、朱毛胡同、春家胡同各1所。另外2所地址不详。

这18条胡同所在的区域,就是后来名满京师的“八大胡同”一带(陕西巷、百顺

① 《金台残泪记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,页247。

② 《梦华琐簿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,页365、366。

③ 《侧帽余谈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,页603、604。

胡同、石头胡同、韩家潭、大外廊营、李铁拐斜街，都是后来的“八大胡同”的骨干）。晚清的“堂子”，事实上就是京师最早的“红灯区”。

堂子集中在这一带的原因很简单，徽班进京的时候，落脚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蕊珠旧史的《梦华琐簿》载：“乐部各有总寓，俗称‘大下处’。春台寓百顺胡同，三庆寓韩家潭，四喜寓陕西巷，和春寓李铁拐斜街，嵩祝寓石头胡同。”^①后来，一些名伶选择自己的私寓的时候，为了保持与大下处联系的方便，就在大下处附近选择住处。再后来，私寓成了堂子，这一带也就成了堂子的渊藪。

同治、光绪时期，作为营业场所的堂子，慢慢集中起来。光绪十二年的《鞠台集秀录》中，记录了当时著名堂子41个，它们的分布是：韩家潭17所，陕西巷、百顺胡同、猪毛胡同、李铁拐斜街各5所，石头胡同、樱桃胡同各1所，另地点不详的2所。在这41所堂子中，名伶最多最著名的5所堂子（绮春堂、熙春堂、韵秀堂、安义堂、国兴堂）有4所是在韩家潭。这时，韩家潭这个地名几乎成了“堂子”的代称和公认的“打茶围”的胜地。有竹枝词为证：

车边人跨面如桃，公子王孙兴致高。川马串铃相配合，韩家潭内走周遭。

韩家潭边明月圆，韩家潭里笙歌繁。金尊夜夜娱宾客，寂寞谁寻芥子园。^②

清兵进入北京之后，对于如何才能使官员和兵丁禁绝腐败、保持骁勇善战的传统，着实用了一番心思，也有过相关的举措。与满、汉分居政策配套的政令还有：严禁“内城”开设戏馆；禁止旗人出入戏园酒馆；严禁官员挟妓饮酒等等。^③

然而，禁令的功用其实很有限。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，历来如此。“内城”不许开设戏园，就到“外城”看戏；旗人不许出入戏园酒馆，官员不许挟妓饮酒，就乔装改扮，或换了便装；不许嫖娼，就改成“狎优”、“打茶围”了。

正如道光八年，华胥大夫在《金台残泪记》中所说：

本朝修明礼义，杜绝苟且。挟妓宿娼，皆垂例禁。然京师仕商所集，贵贱不齐，豪奢相向。赵李狹斜，既恐速狱；田何子弟，乃共嬉春。盖大欲难防，流风易扇。制之于此，则趋之于彼。政俗递转之机，即天地自然之数。今欲毁竹焚丝，凭权藉力未尝不行。然以数十里之区，聚数百万之众，游闲无所事，耳目无所放，终日饱食，诲盗图奸，或又甚焉。^④

可以说，“内城”大量的“寄生者”的存在，和“仕、商”阶层在晚清的发展，是北京“南城”消费性娱乐业活跃的诱因。在宴集、听戏、野游、打茶围……诸多的项目

① 《梦华琐簿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，页365、366、351。

② 《北平梨园竹枝词荟编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下册，页1174、1177。

③ 王利器辑录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（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）页24、20、23。

④ 《金台残泪记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，页252、253。

中,“打茶围”(也就是“逛堂子”)最为红火。从嘉庆、道光,直到光绪,它的兴旺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。

三

关于堂子的情况,虽然晚清的笔记有不少记载,但民国以后,对其研究却很少。在谈到堂子的来历、活动方式等具体情况之前,需要对相关用语的含义加以说明。

1. 相关用语的含义

晚清相关史料、笔记中的“下处”、“堂子”、“私坊”、“私寓”、“相公”、“歌郎”、“优童”、“老斗”、“小友”、“叫条子”,都是与“打茶围”这一行业相关的用语,本文也会涉及,先行注释如下。

下处:即住处。这一说法在宋代笔记、明代小说中都有出现。徽班进京之后,“乐部各有总寓,俗称‘大下处’。”聚于一处的诸伶,自称“公中人”。伶人成为名伶之后,大多会离开“大下处”自己另住,“别立下处”的名伶,“自称曰‘堂名中人’”^①。这一说法在道光年间即已出现。“明童称其居曰‘下处’,一如南人之称‘考寓’。”^②京师或许原本没有“下处”等说法,是南方戏班子的“俗称”在北京的沿用。

堂子:嘉庆八年的《日下看花记》和嘉庆十五年《听春新咏》笔记中,就有伶人以堂名作为住处标识的记载。例如:石宝珠的“宝珠堂”、小庆龄的“贵和堂”、桂宝的“春福堂”、蟾桂的“百忍堂”、翠林的“萃林堂”^③等等。嘉庆、道光之后,这些堂名,成为从事“打茶围”营业的标志,被叫作“堂子”,后来也叫作“相公堂子”。齐如山在《国剧漫谈》中说:“相公堂子又名私坊下处,本界则名堂号或私寓。然私寓二字,已是贬词。”^④也就是说,“堂子”、“私坊”、“下处”、“堂号”、“私寓”这些说法都是指伶人的住处,不过会因为说话人的立场不同、使用的场合不同,而选择不同的说法,意思褒贬上也会稍有差别。伶人本界把名伶自己的住处叫作“堂号”,而不是“堂子”。“堂子”这一说法,在文字上出现的比较晚。杨掌生于道光二十二年的《梦华琐簿》中说,“生旦别立下处,自称曰‘堂名中人’”^⑤,这大概是涉及这一说法的较早的文字记载。在晚清的北京,“堂子”既是已取得成就的伶人带徒弟的处所,但也可能会从事“以歌侑酒”的行业。前者可称为“作为科班的堂子”,后者可称为“作为娱乐业的堂子”。伶人住处的“堂子”主要属何种性质,取决于主人的意向。

① 《梦华琐簿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,页351。

② 《侧帽余谈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,页603。

③ 《日下看花记》、《听春新咏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,页97、160、161、167、183。

④ 《齐如山全集》(台北,重光文艺出版社,1964年)第三册中《国剧漫谈》页35。

⑤ 《梦华琐簿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,页351。

相公：《金台残泪记》说是：“宰辅曰‘相公’，援公孤之义；秀才曰‘相公’，援宰辅之义。北方市人通曰‘爷’，讯其子弟或曰‘相公’；南方市人通曰‘相公’；吴下自呼其子弟亦曰‘相公’。京师梨园旦色曰‘相公’，不知何时始，意亦子弟之义邪？”^①可以得知，这一称呼出现的时间应在道光以前很久。从事“打茶围”行业的伶人，被称作“相公”（一作“像姑”，原因不详）。相公从事的主要是“以歌侑酒”的服务，所以又叫“歌郎”（《众香国》题词云：“各部歌郎，时探听花榜第一姓名”^②）；年龄幼小的相公，也叫“优童”（《燕京杂记》中说：“京师优童甲于天下，一部中多者近百，少者亦数十。”^③）由于“打茶围”也会搀杂狎褻的情况，或者出现类似娼妓侍寝的情况，“相公”这一称号，遂为舆论不齿，而带有贬斥的涵义。本文将会更多使用“名伶”、“伶人”的说法。

老斗：打茶围的顾客；如果与某一相公特别投缘，二人长期交往，相公就把这位顾客称为“老斗”。“老斗”当以有钱人居多。嘉庆、道光年间的竹枝词云：“茶园楼上最消魂，老斗钱多气象浑。但得隔帘微献笑，千金难买下场门。”“面目何分黑与麻，衣裳总是要奢华。身无百万黄金铤，老斗名难买到家。”^④

小友：打茶围的顾客，如果特别喜欢某一优童，二人亦彼此相悦，顾客在赠诗、赠画时，就把优童称为“小友”。这种顾客，以有身份的文人或者文人出身的官员居多。明人周祁《名义考》说：“歌童俗谓之小幼，柔曼溢于女德，或谓能侑饮为小侑，不知幼之名有自来。即汉所谓孺也。高之藉孺，惠之閼孺，皆以婉媚与上起卧，藉、閼其名孺则幼小而可亲慕也。”^⑤“小友”的称呼，抑或与“小幼”“小侑”有沿革关系？

叫条子：打茶围时，客人可以点名要求某某歌郎侍宴、陪酒，主人呈上纸笺，客人把喜欢的歌郎名字写在纸笺上，叫做“叫条子”。在酒楼或者苑面，也可以遣人“飞笺”召条子前来服务^⑥。

2. 堂子“打茶围”行业的来历

中国古代，优伶与娼妓、“梨园”与“青楼”之间的复杂、暧昧关系一直存在。从《青楼集》可以得知，元代女优“侑酒”的情况比之普遍。如张怡云以歌侑酒，与达官、文人赵孟頫、高克恭等过从甚密；曹娥秀既是名优，也是“京师名妓”等等。北京晚清“打茶围”这一涉及情色的行业，身置其间是与苏、扬、皖一带的风气相关。“缙

① 《金台残泪记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，页246。

② 清·众香主人《众香国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下册，页1012。

③ 清·无名氏《燕京杂记》（北京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）页127。

④ 得硕亭《草珠一串》、杨静亭《都门杂咏》，见《清代北京竹枝词》（北京，北京出版社，1962年）页51、78。

⑤ 明·周祁《名义考》见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（台湾，商务印书馆，1983年）856册。

⑥ 《侧帽余谈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，页604。

绅巨室,多蓄优童”^①盛于明代。明代“家班主人备置家庭戏班,有许多是为了淫乐享受‘大都以色不以技也’。”^②明人管志道说:“今之鼓弄淫曲,搬演戏文,不问贵游子弟,庠序名流,甘与俳优下贱为伍,群饮酣歌,俾昼作夜,此吴、越间极浇陋之俗也。而士大夫恬不为怪,以此为魏晋之遗风耳。”^③看来,蓄养优童、倡优不分是明代世风;士大夫“狎优”是吴、越旧俗。

晚清京城“打茶围”是以歌侑酒,也就是戏班中的年轻男演员(特别是男旦)在演出的余暇,从事侍宴、陪酒的收费营业。地点可以是应召前往顾客指定的酒楼饭庄,但大多是在伶人的住处。

娼、优虽然关系密切,但原本不是一个行业。对于娼妓来说,侑酒是本分,歌唱是副业,能唱好歌的娼妓容易走红。对于优伶来说,台上表演是本分,侑酒不是他们的职业。可是,来自安徽、苏扬一带的年轻貌美、能歌善舞的优伶,也从事侑酒的行当;他们的一身二任,就显出比娼妓更多的优势。“打茶围”的出现,把北京原来属于娼妓侑酒的生意,几乎抢(音“呛”)走了十之八九。徽班进京之前,北京戏班子主要是演戏。《燕兰小谱》一书虽也记载有名伶与士大夫交往,甚至相狎的事例,如:王湘云画墨兰、友人蜂拥为他题咏;魏长生走红,和珅与他同性相恋;于三元与“豪客往还,门前颇不冷落”;金陵富商“招伶来寓”^④……但这些在当时仍属个别,大多数名伶的私寓,还不是做生意的场所。

徽班进京之后就有了不同。乾隆南巡时,当时扬州的著名戏班特别受到青睐,而出资、办理南巡“接驾”事务的多是徽商。扬州一带的著名戏班多为徽州人蓄养的徽班,戏班中又以徽州人、苏、扬人居多。这种情况,不仅在扬州,在苏、杭一带也很普遍。所以,徽班进京的同时,也就把徽州人的商业意识和吴、越旧俗一起带进京城。戏班的伶人既做台上的生意,也做台下的买卖,很快就成为风气。在京师,不许旗人出入戏园酒馆、严禁官员挟妓饮酒等禁令的实施比其他地方严格,旗人、官员正苦于无处消遣,因此,“打茶围”生意的出现,也是适逢其时。

打茶围,亦作“打茶会”。唐代钱起有《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》诗,宋代朱彧《萍洲可谈》中也有“太学生每路有茶会,轮日于讲堂集茶,无不毕至者,因以询问乡里消息”^⑤的说法。可见,“茶会”也就是饮茶谈话的聚会。《海上花列传》第三回

① 清·黄印《锡金识小录》卷十〈优童〉转引自胡忌、刘致中《昆剧发展史》(北京,中国戏剧出版社,1989年)页192。

② 《昆剧发展史》页199。

③ 明·管志道《从先维俗议》卷之五(转引自《昆剧发展史》页190)。

④ 《燕兰小谱》见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上册,页7-16、22、48。

⑤ 宋·朱彧《萍洲可谈》卷一,见《笔记小说大观》(台北,新兴书局有限公司,1984年)19编三册,页1629。